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15.06.012

国外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研究述评

王琼^{1,2}

(1. 湖北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湖北 武汉 430205;2.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国外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在狭义上指的是就业保护管制,在广义上还包括政府对工会权利、集体谈判和社会保障方面的管制。效率理论、政权理论和法律起源理论从不同视角对各国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的产生和多样性进行了解释。法规指标和调查指标的出现使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严格程度的度量成为可能,也推动了关于管制影响方面经验性研究的发展。但在管制对就业、生产率等方面的影响研究中,研究结论尚不统一。国外研究的总体状况显示出实证性研究成为主旋律,基于国别背景的研究比跨国研究更为有效,如何创新管制方式以应对发展挑战成为当前研究的新方向。

关键词:政府;管制;劳动力市场

中图分类号:F2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15)06-0074-09

近三十年来,经济发达国家正经历着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制度的重大变革,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型中也面临着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如何调整以提高经济绩效的问题。理论界对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的研究大量涌现,且研究成果丰富,成为管制经济学和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对国外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研究的基本领域和观点进行梳理,将有助于为我国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的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等方面提供参考。

一、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的内涵

国外对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的内涵并没有一个严格的界定。但大多数研究都认为其具有的基本要素包括:通过法律工具制定强制性的劳动相关条款,由政府建立相应的机构来监控和执行这些条款,如果雇主不遵从则要受到法律制裁。^[1]对于管制覆盖的范围,不同研究界定的范围不同。经合组织(以下简称 OECD)的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概念集中于雇佣过程中对企业的限制,包括对劳动合同的规

定、对培训的要求以及解雇程序、遣散费的规定和对集体解雇的特别规定等。这可以看成是狭义的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概念。由于其主要是出于保护劳动者在就业中的权利,故又称为就业保护管制。Besley 等提出的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的范围略有扩大,包括政府制定法规以确定并保护工人权利、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保障工人的工作条件以及收入水平。^[2]Botero 等将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反劳动力市场歧视,并在雇佣关系中赋予劳动者基本权利,例如产假和最低工资等;二是对雇佣关系进行直接管制,例如对劳动合同进行约束,并提高解雇工人或增加工时的成本;三是政府授予工会代表工人的权力,并保护工会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力;四是政府为失业、年老、伤残和疾病等提供社会保障。^[3]可以看出,这一界定将工会权利、集体谈判和社会保障等事项也列入到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的组成部分中,故可以看成是广义的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概念。

收稿日期:2015-09-26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4G285)

作者简介:王琼(1980-),女,湖北武汉人,湖北经济学院讲师,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府管制与劳动经济研究。

二、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的理论动因

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的制度选择,为什么各国的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制度又有所不同?公共利益理论是最早对政府管制的产生进行解释的理论。其认为政府管制的目的是为了纠正市场失灵造成的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以增进社会福利;其提出在欠发达国家,当存在更严重的劳动力市场失灵时,需要更大力度的政府管制。^[4]然而,这一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转型国家中会存在较为普遍的管制失败。其后,效率理论、政权理论和法律起源理论对此问题做出了不同的解释。

(一)效率理论的解释

在处理市场失灵、维护社会秩序和正义方面,为什么会做出政府管制这种制度选择,而不是私人诉讼^①这种制度安排?新制度学派认为制度选择的根源在于是否能提高经济效率。其代表人物科斯提出,政府管制和私人诉讼这两种制度安排到底谁是侵权问题的最好解决方法取决于交易成本的大小;只要私人合约能被法庭有效执行,其就会使资源配置有效率。^[5]因而,早期研究(尤其是科斯的追随者)大多认为私人诉讼的制度安排优于政府管制的制度安排。然而,Becker和Stigler^[6]Posner^[7]从对执法者的激励、执法中的风险控制以及执法成本等角度比较了私人诉讼和政府管制的效果,发现私人诉讼这种解决方法并非比政府管制有效率。Johnson等^[8]Djankov等^[9]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司法程序进行了经验研究,其发现司法程序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使私人诉讼这种解决方法往往带来低效率。Glaeser等提出管制者能够比法庭更容易受到激励而惩罚违法活动,从而有效保护产权。^[5]Glaeser和Shleifer从违反公正的成本入手,比较了在不同的法律和社会秩序环境下,不同的执法机制所带来的效率,其得出的结论是,当违反公正的成本较高时,单独依靠私人诉讼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因为此时法庭不易被利益团体颠覆;在中等法律和社会秩序的国家,法庭较容易被利益团体颠覆,此时单独地采取政府管制或将政府管制与私人诉讼相结合是有效率的,美国在进步时代(1887—1917年)包括劳动场所安全管制在内的一系列管制制度的崛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率率的制度安排;此外,当颠覆正义的成本极低时,一国力图通过政府管制或私人诉讼来纠正市场

失灵,资源将会被浪费在利益集团对法官、官僚的贿赂等活动中,而市场失灵却不会成功解决。^[10]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转型国家会出现普遍的市场失灵。

(二)政权理论的解释

政权理论认为政府管制为政治领导者所利用,以使自己 and 同盟者受益。政权理论包括两类观点,一类观点认为政治决策的主要方式是选举,赢得选举的一方会制定法律以使自身获益;另一种观点认为法律的形成受到各方利益集团的影响,并不仅仅是赢得选举的一方。按照第一类观点,当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和更左翼的政党通过选举上台后,会制定法律,通过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来保护政治同盟者(即劳动者),使其受益。^{[11][12]}按照第二类观点,无论何种政党通过选举当权,为了应对工会的压力,维护自身政治稳定,都会采取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而当工会的力量越大时,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的范围就会越广。同时,民主体制差异也是一国管制制度差异的主要驱动力。Pagano和Volpin基于OECD国家事实的研究表明,民主体制会影响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的结果,比代表选举制与一党多数制会带来更弱的投资者保护和更高的就业保护,从而使管理人员和工人受益,而股权所有者受损;同时,其它政治变量如民主意识形态、投票门坎、行政区域划分的大小、政治者任期的长短等也会影响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的结果。^[13]

(三)法律起源理论的解释

法律起源理论不仅可以解释一国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的产生,还能用以解释各国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呈现的多样性。从这一理论入手,一些研究认为各国管制的差异是由各国法律传统演化而来。民法法系和普通法系国家的政府对经济干预的程度是不同的,前者会利用法律的固有特性,进行更多的政府干预;后者由于裁决权力下放或立法约束,主要依赖法庭裁决,故政府管制更为宽松。^{[14][15]}Botero等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对85个国家劳动力市场管制状况进行了跨国分析,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社会主义法系、民法法系(又称法国法系)和斯堪的纳维亚^②法系的国家比普通法系(又称英美法系)的国家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更为严格。^[9]同时,该研究还发现不同法律传统的国家应对劳动力市场失灵的方式也不同。具有民法法系传统的国家

依靠直接的政府管制来应对市场失灵,而具有普通法传统的国家依靠契约和私人诉讼来应对市场失灵。法律起源理论和效率理论存在一定的共通之处。Mulligan 和 Shleifer 发现,殖民地国家的基本法律及制度是从宗主国法律传统演变而来,这些国家在日后采取与宗主国相似的管制制度比自己从头开始构建一整套管制制度的边际成本要低;因而,这种管制类型演变中的路径依赖是有效率的。^[16]

然而,对法律起源理论的解释也存在质疑。Ahlering 和 Deakin 认为不同制度间具有互补性,各国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的差异性不仅仅由法律起源决定,其也与历史进程中工业化的选择过程相关。^[17]Deakin 追踪了 1970—2005 年英、美、德、法等 5 国劳动法的变化,发现法律起源理论无法解释管制随着时间推移带来的变化,其指出这些变化是由这时期的政治因素而不是法律因素推动的。^[18]Venn^[19]、Gahan 等^[20]进一步证实,近二十年来不同法律起源的 OECD 国家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的严格程度正走向趋同。

三、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程度的度量

对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的研究离不开对管制严格程度的度量,这也是进行经验分析的基础。自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国外对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严格程度的度量取得了较大发展。涌现出的度量方法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法规指标的度量,一类是基于调查指标的度量。

(一)基于法规指标的度量

法规指标度量法是对各国官方制定和公布的劳动管制法规的内容进行评估以判断各国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严格程度的方法。其通常将各种法规条款内容进行层层分解,形成多层次的度量指标。目前使用较为普遍的法规指标为 OECD 制定的就业保护立法指数(EPLI),其主要是对 OECD 国家雇佣领域的立法条款进行评估的指标,也是最早在区域内对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程度进行跨国比较的指标。该指标是在 Grubb 和 Wells^[21]研究的基础上改进而得,并于 1999 年和 2008 年进行了两次修改和完善。最新的指标体系包括对正规合同的解雇保护、对集体解雇的规定和对临时雇用的规定三大类,细分为 21 个基本项。通过这 21 个基本项上反映出的对劳动者就业保护的程度赋予基本分值,乘以相应权重转换为最终分值,由此衡量就业保护管

制的严格程度。指标最终得分范围为 0 分至 6 分,分值越高表示就业保护管制的程度越严格。OECD 较早就基于工作时间、固定期合同、就业保护、最低工资、雇员代表权和社会保护网 6 个方面的管制条款,对几个贸易区内不同国家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程度进行了比较。^[22]Botero 等在对全球 85 个国家管制严格程度的研究中,构建了一套更全面的指标体系,包括雇佣法指数、劳资关系法指数和社会保障法指数三大部分。^[3]每部分指数由不同数量的基本项得分平均而得。分值在 0 至 1 之间,分值越接近 1 代表管制越严格。Deakin 等运用的 CBR 劳动管制指数(LRI)^③由替代性就业合同、工作时间管制、解雇管制、雇员代表权、集体行动 5 个方面的 40 个基本项得分计算而得。^[18]其与 OECD 的就业保护立法指数具有一定相似性,区别在于前者衡量的管制范围更广,而且指标体系由法律条款的具体内容构成,后者则是法律条款的概要说明。

(二)基于调查指标的度量

调查指标度量法是对一国劳动力市场进行实地问卷调查,搜集律师、专家、公共部门官员或企业管理人员对于本国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方面一系列问题的回答,通过回答的差异来赋予各国在各维度上的得分,进而确定各国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的严格程度。调查指标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包括劳动力市场管制指数、高管人员意见调查指数和雇佣工人指数三类。劳动力市场管制指数^④由雇佣管制和最低工资、工作时间限制等 6 个子指标的分值加总平均而得,得分范围为 0 到 10,分值越高表示管制程度越低,即意味着一国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度越高。高管人员意见调查(EOS)^⑤指数的受访者为各国公司总裁或高级管理人员。每个国家采访 60 至 70 个高管,采访问题涉及宏观环境、基础设施、技术、公共政策等领域,回答得分越高说明该国管制规定越灵活。雇佣工人指数(EWI)^⑥建立在 Botero 等^[3]的研究基础上,受访者为律师和公共部门的官员。该指数由雇佣难度指数、工作时间刚性指数和解雇难度指数三个子指数平均而得;三个子指数又分别包括 16 个基本项。最后得分范围为 0 至 100,数值越高说明该国的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越严格。

由于调查指标度量主要是基于受访者的回答赋予分值而做出评估,因而其可以反映各国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法规在执行过程中带来的真实状况。

但其不足之处在于是根据受访者的主观回答做出,难以避免会带有主观性。相比之下,法规指标度量是对“纸上”的管制条款内容进行评估,具有相对客观的特点。但无论是法规指标还是调查指标都在经验分析中得到广泛运用。

四、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的经济影响

经济学领域对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管制对就业、生产率(经济增长)和收入平等方面的影响。其中,经验性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经验性研究中,有的针对经济发达国家的管制事实,有的针对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型国家的管制事实;有的进行跨国比较研究,有的基于国别背景来研究。

(一)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对就业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政府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管制会影响企业的用工成本,进而影响劳动力需求。20世纪80至90年代,美国较松的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状况和相对较低的失业率,与欧洲国家整体较严格的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状况和相对较高的失业率形成鲜明对比。高失业是否是因为严格的政府管制带来的劳动力市场刚性造成的,以及欧洲国家是否应该为降低失业率而放松管制,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OECD关于工作策略讨论的核心观点是,包括最低工资、就业保护立法、失业救济金、工资制定机制等在内的政府干预都是欧洲高失业的重要原因。^[23]较低的工资弹性、较高的工会化程度减少了工资变化的灵活性,就业保护立法和高工薪税增加了企业用工成本,失业救济金的上升降低了失业人口的就业激励,从而导致了高失业;故欧洲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应该放松。^[24]然而,Nickell认为,粗略地将欧洲国家的高失业率归于劳动力市场刚性具有误导性,因为OECD国家之间失业率也存在很大差异,失业率低的国家与失业率高的国家相比,劳动力市场并非更富有弹性。^[25]不过,其在后来的研究中通过经验数据得到的证明是,即使经济衰退带来的总需求的变化是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欧洲失业率上升的重要因素,也不能否认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制度变化带来的影响,而后者可以解释欧洲总体失业率上升的55%。^[26]由于宏观冲击也是劳动力需求量变动的重要因素,另一部分学者如Blanchard和Wolfers、^[27]Bertola等^[28]将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真实利率变化、通货膨胀率变化等宏观冲击

(及基线变量)与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制度结合起来,来分析欧洲失业的总体演变和个别国家的异质性。这些文献提出的观点包括:宏观经济冲击虽会造成失业率的上升,但各国失业的规模大小仍依赖于各国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制度的差异;当一国面临不利冲击时,保护性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会使高失业率难以回落。因而,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状况虽无法解释欧洲总体失业率的上升,但可以解释失业率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然而,Baccaro和Rei、^[29]Howell等^[30]考察了以往研究的数据和方法,发现得出管制与高失业率正相关的研究证据并不充分,劳动力市场刚性与失业之间并无简单的对应关系,不同的国家和人群间都会存在差异,实证研究中很难找出具有可比性的稳健方法。Avdagic、^[31]Heyes和Lewis^[32]进一步研究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一些欧洲国家放松管制带来的经济现实,发现放松管制侵蚀了工人的就业安全,并未达到增加就业和刺激经济恢复的目的。

在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对就业影响的研究中,关于美国国内最低工资管制的就业效应的研究曾出现过激烈争论。劳动力市场理论模型关于提高最低工资是增加失业量还是降低失业量,提出了相互矛盾的预测。竞争市场模型显示出最低工资的提高会减少就业,而垄断市场模型暗示更高的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针对理论模型结果的差异,大量的研究力图为上述理论寻找经验证据。早期的经验研究大多验证了竞争市场模型预测的结果。但这些研究大部分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方法,其局限性在于观测测量不是独立变量,尽管研究中会试图控制观测变量的结构性变化,但很难将最低工资变化产生的效应和其它结构性变化产生的效应区分开,且容易出现偏误而放大最低工资增加带来的负效应。为克服上述局限性,一些研究开始运用“自然实验法”。其特点在于将真实实验的条件进行复制,把外生政策变量至于两个人口子集(即治疗组和控制组)中进行比较,通过相对就业水平的变化而不是绝对就业水平的变化来反映最低工资变化带来的就业效应。Card和Krueger利用自然实验法,选择最低工资额上升的新泽西州和同一时期最低工资额保持不变的宾夕法尼亚州构成治疗组和控制组,运用快餐业的调查数据得到的研究结果为,最低工资额提高的新泽西州就业量反而相对上升,这显示出最低工资

的提高带来轻微但统计上显著的就业正效应。^[33]这一结论引起了理论界的大讨论。由于他们利用的是电话访问数据,调查数据是否存在测度错误是争议的焦点。Neumark 和 Wascher 利用工资单显示的数据对同一案例进行了再次研究,研究结果与 Card 和 Krueger 的结果相反。该研究发现新泽西州的最低工资上升使该州相对于宾夕法尼亚州就业下降了 3.9%至 4.0%,其得出的劳动需求弹性值仍与早期时间序列估计值一致。^[34]Card 和 Krueger 又利用 BLS 数据对该案例进行了重新验证,认为 Neumark 和 Wascher 得到的负效应的结论也不可靠,其结果可能是由于数据中单一孤立点造成的。^[35]其后,这一案例又进行了多次讨论,其研究结论也不断反复。^[36]

虽然大量研究在最低工资管制对就业总量的影响方面至今仍存在争议,但在对就业结构的影响上,仍然出现了一些较普遍认同的观点。一是最低工资管制对男性失业率影响不大,但却会对低技能者、青年和女性等群体失业率以及就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37]二是最低工资管制对不同产业部门就业的影响也是不同的。^[38]三是最低工资管制的就业效应还受到时期选择的影响,即就业效应的大小与所观察数据的时期跨度长短有关系,最低工资提高对就业带来的负面效应在长期中较为明显。^[39]

(二) 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对生产率和增长的影响

较多研究都从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对企业或产业部门带来的约束来研究其对生产率和一国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Poschke 发现,严格的就业保护管制由于会给企业带来较高的解雇成本,故会减少劳动力流动总量,阻碍企业的市场进入和低效率的企业退出,进而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影响生产率提高;美国和欧盟国家在 IT 服务业上较大的生产率差异就是一个具体表现。^[40]Dreher 和 Schneider 运用 120 个国家横截面数据和 70 个国家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严格的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与一国影子经济的扩张甚至腐败问题也存在关系,良好的管制执法会缩小一国影子经济的范围;同时,在高收入国家中,腐败和影子经济往往是替代品,而在低收入国家中,两者往往成为互补品。^[41]相似的结论还反映在 Dabla-Norris 和 Inchauste 的研究中。其利用东欧和中亚 27 个国家企业层面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

劳动力市场政府管约束和执法质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取决于这些企业是处于正规部门还是非正规部门,管约束会对正规部门企业的成长产生负面影响,但对非正规部门企业的影响不大,因为一些非正规部门往往被排斥在劳动法规的约束之外。^[42]然而,Storm 和 Naastepad 利用 OECD 中 20 个工业化国家数据的研究表明,不同国家的政府在集体谈判、就业保护等劳资关系领域的管制差异很大,存在这些管制的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更快;应警惕那种放松政府管制会促进生产率提高的观点,因为放松政府管制难以激励工人在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中做出贡献。^[43]

针对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研究也较为丰富。Besley 和 Burgess 利用印度制造业数据研究了该国劳资纠纷法修改后带来的影响,得出的结论为,该法的修改降低了正规制造业部门的投资水平、就业量、生产率和总产出水平;虽然该法修改的目的是为保护劳动者利益,但最终并没有实现改善工人福利的初衷,反而导致了城市贫困率的上升。^[44]Ahsan 和 Pagés 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论,即该国就业保护法和劳资纠纷法修改后,劳动密集型部门受到严重打击,资本密集型部门也由于劳动争议成本的上升而受到负面影响,且负面影响并不会因为劳动合同覆盖面的提高而缓解。^[45]Heckman 和 Pagés 对拉美国家就业保护管制的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降低了这些国家的总体就业水平,增加了劳动力市场收入不平等,使年轻劳动者、未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以及农村劳动者利益受损。^[46]然而,也存在一些相反的研究结果。例如,Jha 和 Golder 认为,印度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保护制度并不是其经济增长的障碍;在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方面,除劳动法规外还需要考虑更多的变量。^[47]UNIDO 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的研究报告发现,对于一些欠发达的国家,不恰当的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并不大,熟练劳动力的短缺反而是其经济增长更大的约束。^[48]

五、研究的启示和新思路

从国外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研究状况不难看出,该领域的研究涉及面较广。各国经济、社会状况和政治体制的差异带来了研究的复杂性,也产生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和尚不统一的研究结论。从总体来

看,其显示出的研究特色和新的思路如下:

(一)以管制度量为基础的实证性研究成为主旋律

国外关于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实证性研究方法被广泛运用。在理论研究产生较大分歧之后,经验性研究大量涌现以检验理论框架的合理性和适用性。而经验性研究得以开展的基础是对一国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严格程度的度量。国外创造出的一系列法规指标和调查指标对经验研究和政策评估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国内研究中,对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严格程度度量问题的研究和指标创造还非常缺乏,由此不仅对我国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的严格性缺乏总体把握,也使得经验研究难以大规模和深入展开。同时,国外经验研究的发展还推动了计量研究方法的创新和完善。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方法和“准自然实验”方法在时间序列分析后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使得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大幅度提高。相比而言,国内经验性研究不仅研究领域非常有限,其方法还大多从国际移植,研究的创新性还明显不足。

(二)应更加重视基于国别背景的研究

国外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研究结论呈现多元化。无论是在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产生的原因研究还是管制影响研究方面,研究结果都难以统一。这其中不乏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差异带来的影响,也不乏样本选择中各国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不同带来的差异。虽然跨国比较分析在国外经验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其存在的不足也逐渐显现。一是各国数据口径问题会使研究结论并不完全有效;二是各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差异使得单一的模型难以适用。^{[30][48]}由此,考虑政治体制的单个国家的案例分析往往可以提供比跨国研究更准确的结论。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型国家而言,劳动力市场大多不成熟,劳动力市场不正规带来的问题与政府管制过多带来的问题往往容易混淆。基于国别背景的研究更能控制具体的发展环境,将管制活动置于一国政治体制、法律背景和经济发展阶段中予以考虑,不仅可以使管制产生的原因研究更加具体化,也利于区分政府管制变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到底是总体性还是结构性,以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改善的建议。对于我国而言,劳动力

市场虽已建立起来,但长期以来二元经济结构带来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状态并未彻底改善,一些损害劳动者利益或者不利于市场机制资源配置效率发挥的因素并不是单一的管制不足或管制过度造成的。由此,在管制研究中,经济转轨阶段、劳动人口数量、二元经济特征甚至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都是需要考虑的现实因素。因而,基于我国的国情背景来对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问题进行研究以提出结构性调整的建议对我国政府管制制度的优化将更为有益。

(三)应注重管制方式的创新以应对发展挑战

国外研究中长期关注的是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过严是否会减少就业量,影响生产率的提高。而当前老龄化和经济危机后出现的经济低迷给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持续发展带来更严峻的挑战。一些研究提出,以保护劳动者权利为目标的政府管制不仅应着眼于如何减少失业的数量,更应致力于提高劳动者就业的质量,包括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如结社自由和集体协商、避免强制性劳动和工作场所歧视,而最为关键的应是帮助劳动者改善自身就业能力;这不仅可以使其获得体面而有创造性的工作,同时也是促进企业创新和生产率提高的必要因素。^[49]而传统管制中采取的单一的“命令—控制”方式在刺激雇主遵从劳动法规以及对工人培训和提高工人劳动技能方面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方式,常常与政策目标事与愿违,并带来劳动力市场的刚性。由此,如何创新管制方式以使管制活动更为有效应是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50]而不再停留于是否应该管制和管制多少的问题。^[51]新的管制方式例如“软管制”(即运用财政补贴、税收工具和提供政府合同订单来劝止不良行为和刺激企业培训)、“联合管制”或“自我管制”(即促进私人部门在管制活动中的积极参与)等在现实条件下往往具有更为理想的效果。对于经济转型国家而言,劳动力市场不规范再加上当前的老龄化趋势使得政府在实现经济发展方面同样面临较大的挑战。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规范非正规就业部门中用工行为也是未来不容忽视的问题。由此,如何调整劳动法规使其更具有包容性以及如何创新管制方式使其能更有效地实现发展目标,也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转型国家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研究的重要方向。

注 释:

- ① 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在 20 世纪 30 年代之前,经济领域长期自由放任。在政府管制出现之前都是由私人诉讼(即司法程序)方式来解决纠纷的。但司法程序会出现低效率,因为立法者、法官、检察官和陪审团会因接受贿赂或由于政治压力而做出非公正的法庭判决,而维护公正往往要耗费成本。
- ② 即北欧的瑞典、挪威、丹麦和芬兰。
- ③ 该指数由剑桥大学商业研究中心(Centre for Business Research in Cambridge)的经济学家和律师开发,是一组关于法、德、印度、英、美五国在 1970 年至 2006 年间公司、破产和劳动法的纵向指标体系,用来分析股东保护、债权人保护和劳动管制。
- ④ 该指数是弗雷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开发的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的组成部分。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是衡量全球各国或地区经济自由度的指数体系,从 1970 年开始每年出版年度报告。
- ⑤ 即 Executive Opinion Survey,其是由世界经济论坛与国际发展中心、战略与竞争力研究所每年合作实施的项目。调查资料用来计算全球竞争力指数,并出版《全球竞争力报告》。
- ⑥ 该指数是世界银行集团开发的营商便利度指数的子指数。世界银行集团从 2004 年开始实施营商环境研究项目,对世界 185 个国家以及区域内所选城市的营商法规及其执行情况进行度量,由此开发了营商综合指标,以此计算相应指数,并出版《全球营商环境报告》。

参考文献:

- [1] R. Block, K. Roberts. A Comparison of Labor Standard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J]. Industrial Relations, 2000, (2): 273-306.
- [2] Timothy Besley, Robin Burgess. Can Labor Regulation Hinder Economic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India[R]. CEPR Discussion Papers, 2002.3260.
- [3] Juan C. Botero, Simeon Djankov, Rafael La Porta,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rei Shleifer. The Regulation of Labor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4, (4): 1339-1382.
- [4] Joseph E. Stiglitz. Markets, Market Failures, and Development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9, (2): 197-204.
- [5] Edward Glaeser, Simon Johnson, Andrei Shleifer. Coase versus the Coasians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1, (3): 853-899.
- [6] Gary Becker, George Stigler. Law Enforcement, Malfeasance, and the Compensation of Enforcers [J].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974, (1): 1-18.
- [7] Richard Posner. Economics Analysis of Law [M]. Boston: Aspen Publishers, 1998.
- [8] Simon Johnson, John Mcmillan, Christopher Woodruff. Courts and Relational Contracts [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2002, (1): 221-77.
- [9] Simeon Djankov, Rafael La Porta,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 Andrei Shleifer. Courts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 (2): 453-517.
- [10] Edward Glaeser, Andrei Shleifer. The Rise of the Regulatory State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3, (2): 401-425.
- [11] Gosta Esping-Anderson.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12] Alex Hicks. Social Democracy and Welfare Capitalism [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3] Marco Pagano, Paolo Vo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5, (4): 1005-1030.
- [14] Edward Glaeser, Andrei Shleifer. Legal Origins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2, (4): 1193-1229.
- [15] Simeon Djankov, Rafael La Porta,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rei Shleifer. The Regulation of Entry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2, (1): 1-37.
- [16] Casey Mulligan, Andrei Shleifer. Conscription as Regulation [J]. American Law and Economics Review, 2005, (1): 85-111.
- [17] Beth Ahlring, Simon Deakin. Labor Regulatio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Legal Origin: A Case of 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y[R]. Centre for Business Research,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Working Paper No.312, 2005.
- [18] Simon Deakin, Priya Lele, Hias Siems. The Evolution of Labor Law: Calibrating and Comparing Regulatory Regimes [J]. 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 2007, (3-4): 133-162.
- [19] Danielle Venn. Legislation, Collective Bargaining and Enforcement: Updating the OECD Employment Protection Indicators [R]. OECD Social, Employment and Migration Working Papers, 2009.89.
- [20] P. Gahan, R. Mitchell, S. Cooney, A. Stewart, B. Coope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Convergence in Labor Market Regulation: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J].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2012, (3): 703-742.
- [21] D. Grubb, W. Wells. Employment Regulation and

- Patterns of Work in EC Countries [Z].OECD Economic Studies,1993.21.
- [22] OECD. Labor Standards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EB/OL].<http://www.oecd.org/els/emp/2409984.pdf>, 1994.
- [23] OECD. The Jobs Study: Facts, Analysis, Strategies [M]. Maryland: Congressional Information Service, Inc., 1994.
- [24] Horst Sievert. Labor Market Rigidities: At the Root of Unemployment in Europe [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7,(3):37-54.
- [25] Stephen Nickell. Unemployment and Labor Market Rigidities: Europe versus North America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7,(3):55-74.
- [26] Stephen Nickell, Luca Nunziata, Wolfgang Ochel. Unemployment in the OECD Since the 1960s: What Do We Know[J].Economic Journal,2005,(500):1-27.
- [27] Olivier J. Blanchard, Justin Wolfers. The Role of Shock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Rise of European Unemployment: the Aggregate Evidence [J].Economic Journal(Conference Papers),2000,(462):C1-C33.
- [28] Giuseppe Bertola, Francie D. Blau, L. M. Kahn.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Labor Market Outcomes: Less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from International Long-Run Evidence[A].A.B. Krueger, R. Solow. The Roaring Nineties: Can Full Employment Be Sustained?[C].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0.
- [29] Lucio Baccaro, Diego Rei.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Unemployment in OECD Countries: A Time Series Cross-Section Analysis(1960-1998)[R]. ILO Discussion Paper,2005.160.
- [30] David R. Howell, Dean Baker, Andrew Glyn, John Schmitt. Are Protective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at the Root of Unemployment?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Evidence [J]. Capitalism and Society, 2007,(1):1-70.
- [31] Sabina Avdagic. Does Deregulation Work? Reassessing the Unemployment Effects of Employment Protection[J].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2015,(1):6-26.
- [32] Jason Heyes, Paul Lewis. Relied upon for the Heavy Lifting: Can Employment Protection Legislation Reforms Lead the EU out of the Jobs Crisis? [J]. Industrial Relations Journal, 2015,(2):81-99.
- [33] David Card, Alan B. Krueger. Minimum Wages and Employ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Fast-Food Industry in New Jersey and Pennsylvania[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4,(4):772-793.
- [34] David Neumark, William Wascher. Minimum Wages and Employ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Fast-Food Industry in New Jersey and Pennsylvania: Comment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0,(5):1362-1396.
- [35] David Card, Alan B. Krueger. Minimum Wages and Employ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Fast-Food Industry in New Jersey and Pennsylvania:Reply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0,(5):1397-1420.
- [36] Walter J. Wessels. Reexamination of Card and Krueger's State-Level Study of the Minimum Wage [J]. Journal of Labor Research, 2007,(1):135-146.
- [37] Michael Shannon. The Employment Effects of Lower Minimum Wage Rates for Young Workers: Canadian Evidence [J]. Industrial Relations, 2011,(4):629-655.
- [38] Joseph Sabia. The Effects of Minimum Wage Increases on Retail Employment and Hours: New Evidence from Monthly CPS Data [J]. Journal of Labor Research, 2009,(1):75-97.
- [39] Prabirji Sarkar. Does an Employment Protection Law Lead to Unemployment? A Panel Data Analysis of OECD Countries (1990-2008)[J].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013,(6):1335-1348.
- [40] Markus Poschke. Employment Protection, Firm Selection, and Growth [D]. IZA Discussion Paper,2007.3164.
- [41] Axel Dreher, Friedrich Schneider. Corruption and the Shadow Economy: An Empirical Analysis [D]. IZA Discussion Paper,2006.1936.
- [42] Era Dabla-Norris, Gabriela Inchauste. Informality and Regulations: What Drives the Growth of firms? [D] IMF Staff Papers, 2008,(1):50-82.
- [43] Servaas Storm, W. M. Naastepad. Labor Market Regulation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Evidence for Twenty OECD Countries (1984-2004) [J]. Industrial Relations, 2009,(4):629-654.
- [44] Timothy Besley, Robin Burgess. Can Labor Regulation Hinder Economic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India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4,(1):91-134.
- [45] Ahmad Ahsan, Carmen Pagés. Are All Labor Regulations Equal? Evidence from Indian Manufacturing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9,(1):62-75.
- [46] James J. Heckman, Carmen Pagés. The Cost of Job Security Regulation: Evidence from Latin American Labor Markets [R].NBER Working Paper,2000.7773.
- [47] Praveen Jha, Sakti Golder. Labor Market Regula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A Critical Review of Arguments and Some Plausible Lessons for India [R]. Economic and Labor Market Paper,2008,1.
- [48] UNIDO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

- zation). Creating an Enabling Environment for 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 in Sub-Saharan Africa [R]. Vienna, 2008.
- [49] Sangheon Lee and Deirdre McCann. Regulating for Decent Work: New Directions in Labor Market Regulation [R]. Palgrave/ILO, 2011.
- [50] Colin Fenwick and Colin Novitz. Human Rights at Work: Perspectives on Law and Regulation [M]. Hart Publishing, 2010.

(责任编辑:卢君)

Review of Foreign Research on Labor Market Government Regulation

WANG Qiong^{1,2}

(1.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Wuhan Hubei 430205, China; 2.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 Labor market regulation in foreign research refers to employment protection in the narrow sense, and in the broad sense it also includes government controls on trade union, collective bargaining and social security. Theory of efficiency, theory of political power and theory of legal origin explain the reasons of emergence and diversity of labor market regulation in the world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Different indicators based on legislative provisions or survey make it possible to measure the stringency of labor market regulation and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empirical studies on the economic impacts brought by the regulation. But consistency in conclusions has not been reached in the influence of regulation on employment and productivity. It shows that empirical studies have become the main themes, the research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specific country can draw more valid conclusions than transnational research, and the innovation of regulatory approach for countries to deal with new challenges is becoming a new direction in research.

Key words: government; regulation; labor market